

■ 哲学研究

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摘要: 梁启超的《新民说》阐发一种力本论,把力本论与个人观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梁启超持有一种崇尚力量的个人观,简称力性个人观。这种个人观认为,力性的个人将是一个体力强健、心力饱满和能力超拔的现代个人,是一个有“力”度的个人。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所讲的力本论有颠覆传统哲学的力命和王霸之辨的倾向,揭示出现代个人观由德性个人观向力性个人观的转型。

关键词: 梁启超 《新民说》; 力性; 个人观; 力本论; 德性个人观

中图分类号: B2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6)01-0103-06

收稿日期: 2014-06-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2-0183)

作者简介: 顾红亮,男,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言

在梁启超的个人观研究上,学术界有几种看法。这里列举三种代表性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以张灏为代表,他认为梁启超的新国民理想实质上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是梁国民思想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民的社会的自我几乎完全掩盖了个人的自我……梁的国民思想更接近于以集体主义取向为核心的古希腊的国民,而不接近于以个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国民。”^{[1]155}①第二种看法以黄克武为代表,他认为梁启超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集体主义者,梁启超强调的是“非穆勒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的,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33}。第三种看法以杨贞德为代表,她认为,梁启超虽然主张个人的自由与自治,但是没有建

立起以自由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观,把个人的生存意义依附于群体的福祉。“在他的自由论述中,‘个人’在面对以实现真我和求取群利为名的威胁或迫害时,寻不着理据作为保护自己的最后堡垒。”^{[3]137}这些看法在梁启超的文本中都能找到证据,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认为,对于梁启超的个人观,可以有多种角度加以阐释,力本论(Dynamism)是其中之一。虽然张灏的论著分析到梁启超的力本论,但是没有把力本论与梁启超的个人观作更紧密的勾连,而且其对力本论的理解在狭义层面上展开。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多处提到“力”,阐发力本论的基本思想。在“论进取冒险”一节里,他认为进取冒险精神的确立源于四个方面,分别是希

① 另可参见罗晓静《寻找“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望、热诚、智慧和胆力。张灏把这四个方面看做是“构成西方文化力本论的四个要素”^{[1]133}。在《论尚武》一节里,他讲道,尚武精神的培养需要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可见,尚武的实质是尚力。在《论生利分利》一节里,他说生利之力包括体力和心力,心力又包括智力和德力。《新民说》还有《论毅力》和《论政治能力》两节与“力”的论说有关。从这些内容来看,“力”是《新民说》几个核心观念之一。把“力”的观念与个人观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梁启超持有一种崇尚力量的个人观,简称力性个人观。

按照张灏的说法,梁启超的力本论精神有两个表现,即竞争和进取冒险精神。^{[1]62-63,119,126}其实,梁启超主张的力性精神的表现并不限于这两种精神,可扩展至体力、心力和能力之域。因为一般来说,“力”包括体力、心力和能力。体力指身体力。心力指精神力,具体包括智力、德力、意志力、胆力和毅力等。竞争和进取冒险精神都可通过力本论得到解释,进取冒险精神属于心力范畴,竞争可以在体力之间、心力之间或能力之间进行,可见,竞争和进取冒险精神是力本论和力性个人观的表现,但不是根本表现。诠释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的较佳视角在于体力、心力和能力三个概念。下面就从这三个概念入手,展示力性个人观的现代内涵。

二、有体力的个人

梁启超在讲到尚武精神的培养时讲到体力。体力概念从生理学的角度理解身体,把身体还原为一个活的机体或生命体。作为生命体的身体不仅有“力”,而且能生产“力”,具有生产性。身体之“力”有多个含义,可以指身体的健壮力,指身体的忍耐力,指身体的生命力,也可以指身体的生产力,身体具有再生产或生育下一代的功能。梁启超注意到身体的“力”性,把体力归为培养尚武精神必备的要素。

梁启超不满足于从生理学的角度观察身体,他把身体素质与国民的竞争、国家的竞争联系起来,赋予身体以政治意义。梁启超以欧洲人重视体育锻炼为例,提醒中国人要重视身体素质,以增强身体的竞争力,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他说:

“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蹴鞠、角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昔仅一斯巴达者,今且举欧洲而为斯巴达矣。”^{[4]191}

相比欧洲人的体格和身体素质,中国人相当于“病夫”。他说“合四万万,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犷猛泉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191}梁启超用“病夫”作比喻,说明中国乃是一个“病国”。病是乏力和不健康的表现。“病夫”和“病国”的比喻说法显示身体与国家的弱态与弱势。

把个人看做“病夫”,把国看做“病国”,这个论说的背后有学科知识的影子,它把个人(身体)的问题和国家的问题转换成科学的问题,即医学的问题。有病需要治疗,而且需要对症下药,以求疗效显著,这是医学解题的思路,是身体治疗的思路。梁启超用身体的治疗作隐喻,说明中国的民众与中华民族需要治疗。在近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病夫”是一个屈辱的象征,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称呼。该称呼以身体之虚弱、病态来指称民族的衰败。身体之弱被赋予了民族之弱的象征意义,身体之无力被赋予了民族之无力的象征意义。

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个人身体的治疗成为民族救亡的一部分,身体被纳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之中。身体不单是一个生理性的存在,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是一个符号性的存在。身体的强健、有“力”与否不仅是个人的小事情,也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情,身体之“力”被打上了救亡的烙印。换言之,个人的身体被政治化了。

梁启超不仅把身体之“力”与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使身体被政治化,而且把身体之“力”与科学联系起来。在中国近代,“力”成为一个科学概念。严复在解释宇宙的发生过程时使用“质力相推”的命题。他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5]IX}“质”和“力”都是力学的基本概念,在力

学里,“质”可指具有一定质量的质点或物体,“力”可指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场力、摩擦力等。“质”与“力”的相互作用,引起宇宙万物的演化。虽然严复还用乾和坤等传统哲学的概念来比照西学中的“质”和“力”,但是,“质”和“力”都是现代科学的概念。梁启超对“力”的看法延续了严复的观点。当他把身体与作为科学概念的“力”结合起来以形成“体力”概念的时候,他给“体力”注入了科学的元素,使“体力”也成为具有科学色彩的概念。“体力”不仅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力”,而且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力”。这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增强“体力”,保持健康。有“体力”的个人成为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的一个具体表现。

三、有心力的个人

与身体之“力”(体力)相应,精神也有“力”,即心力。梁启超强调身体之“力”与精神之“力”之间的连贯性,身体之“力”之于精神之“力”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精神力包括意志力、胆力和毅力等。

“心力”概念在晚清思想家那里用得比较多,谭嗣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都曾使用此概念。在“五四”以后,“心力”概念似乎有被弱化的趋向,很少有人使用。在梁漱溟、熊十力等少数哲学家的著作中,这个概念还被提及。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也曾使用这个概念,说“我们中国问题中的中心问题,是人格问题,心力问题”^{[6]650}。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力”被一组现代心理学术语代替了,这些术语包括情感、意志、理智、潜意识和生命等,它的含义被分化了。这个背景提示我们,有必要关注晚清的“心力”概念的复杂性。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其含义尚未完全分化,但包含着分化和转化的可能性。

梁启超认为,强健的体魄支撑坚忍的意志力。他说“体魄者,与精神有切密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是以古之伟人,其能负荷艰巨、开拓世界者,类皆负绝人之异质,耐非常之艰苦。”^{[1]190}这段话提到的“坚忍不屈之精神”主要指意志力,“坚忍不屈”通常是描述意志品格的术语,形容意志的专一或坚定。梁启

超还有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说法“盖心力散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1]189}这句话里的“心力”常被解释为意志力,整句话突出了意志的专一品格。成就大事业的个人无不具有坚定的意志力。

作为意志力的心力是狭义的,心力还有广义的一面,指精神力。广义的心力还包括胆力。胆力指勇敢,有胆量,不畏惧。梁启超说“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往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途。天岂必除相此难境畏途以独私之哉?人间世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我以为难,以为畏,则其心先馁,其气先慑,斯外境得乘其虚怯而窘之。”^{[1]190}胆力昭示的勇敢不是盲目的。“然胆力者,由自信力而发生者也。……不信之人,而信之己。国民自信其兴则国兴;国民自信其亡则国亡。”^{[1]190}梁启超所说的胆力不是一股蛮力,而是以自信力为基础的。

广义的心力还包括毅力。在某种程度上,毅力与意志力有重合的部分。说一个人有毅力和一个人有坚定的意志力,这两种说法意思比较接近。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举摩西和哥伦布等人的例子,说明毅力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1]167-169}具体地说,梁启超区分了两种毅力,即刚毅和沉毅。“故吾尝谓毅力有二种:一曰兢惕于成败,而竭尽全力以赴之,鼓余勇以继之者,刚毅之谓也;二曰解脱于成败,而尽天职以任之,献生命以殉之者,沉毅之谓也。”^{[1]171}刚毅指刚强勇武般的毅力,说明毅力之勇猛;沉毅指直面牺牲而百折不挠般的毅力,说明毅力之沉潜与镇定。

广义的心力也包括进取冒险精神。这一精神的确立有四端,源于四个方面,分别是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1]79-82}对于未来有所希望,有所憧憬,才会有冒险的动力。敢冒险者常常身怀热诚之心,对于所希望的东西充满激情与热爱。冒险者要做到不莽撞,就要对所追求的东西进行调查,了解详情。了解得越多,所得的智慧越多,行动就越有信心。除此之外,冒险者还需要有胆力,有魄力,行事不畏畏缩缩,有决断力。梁启超称拿破仑、纳尔逊和曾国藩都是有胆力的豪杰。

梁启超把心力、胆力和体力合起来统称尚武精神,把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合起来视作进取冒险精神,还把毅力作专节主题加以论说。在笔者看来,毅力、尚武精神和进取冒险精神都可看做心力的不同表现。张灏说“毅力和进取冒险精神两个概念表明‘力’的概念更接近于近代西方‘理性地征服世界’的思想,而不接近于儒家‘理性地适应世界’的思想。”^{[1]130}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尚武与冒险精神体现西方人崇尚竞争的价值观和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梁启超凸显这一精神,一方面显示他对西方文化中的现代精神有相当的了解,另一方面显示他试图把西方的现代精神注入中国的现代个人观,使现代个人观的建构成为可与西方对话的活动。

四、有能力的个人

在《新民说》里,梁启超没有设专节讨论能力,但有专节讨论政治能力,我们从中可以略窥梁启超关于能力的个人观的思路。

个人的能力不是纯粹的心力,因为它与实际的行为相连,有一定的外显性。个人的能力也不是纯粹的体力,虽然它的实现可能需要依靠身体的协助,但它独立于体力,与技艺、智慧相连。可以说,能力是一种连接体力和心力的“力”。

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梁启超担忧的是中国缺乏有能力的个人,并不担忧中国缺乏有思想的个人。他说“吾以为今后之中国,非无思想之为患,而无能力之为患……故欲进无思想者为有思想者,其事犹易;欲进无能力者为有能力者,其事实难。”^{[1]236}如果把思想归为知识一类,把能力归为行动一类,那么上述说法可用知易行难说加以概括,这和后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正相反对。梁启超主张个人能力的培养难于思想的启蒙,这是说,仅仅依靠思想的启蒙,无法培养出有能力的个人。思想之“力”和能力之“力”之间有较大的距离。

梁启超将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这句话理解成政治能力是人的天性(或本能)之一,人天然有此能力。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人很少显现出实际的政治能力,换言之,此种天性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没有得到很好的滋养和发展。梁启

超从专制政体、家族制度、生计和丧乱等角度入手,分析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不利于政治能力天性的生长。他说“夫其伏于专制之羁轭,困于家族之范围,役于生计之奴隶,盖本能之斲丧者,既已十六七矣,而犹或潜滋暗长,萌蘖非无,无如更数十年,必经一次丧乱,辄取其前此所积累之根柢而一扫之。”^{[1]240}梁启超列举的都是一些外在的困扰,正是这些环境性因素使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天性被压抑或摧残。这里,他似乎忽略了能力受压制的内在性因素或个人的主观性因素。这一忽略和前面提到的知易行难的主张是一致的。

按照梁启超的思路,个人能力的培养比思想的启蒙更困难、更迫切。这里的个人首先指的是哪种人呢?也就是说,何种人的能力的培养更优先呢?梁启超说,当我们谈论国民能力的培养时,不要把眼睛盯着普通的国民,想着如何以启蒙者的身份把能力传授给国民,而要把视线转到自己身上来,考虑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他所说的我们自己指的是有思想的“中等社会”。他说“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苟不尔者,漫言曰养之养之,其道无由。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1]241}“中等社会”的组成成员比较复杂,梁启超没有明说,杨笃生在《新湖南》(1903)中有所论述。他指出这个社会包括三类人:第一类人指“自居于士类者”,即士和新式知识分子;第二类人指“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第三类人指“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大抵指自由职业者。^{[7]629}可见,“中等社会”既不是当权者,也不是底层社会,也不完全等于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社会或公民社会,但它负有重责,“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7]615}。肩负此等责任的“中等社会”实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因此,“中等社会”成员的能力培养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具有

重要意义。梁启超对“中等社会”中的个人发出培养能力的呼吁,这无疑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卓识。

有学者指出,访美回来后,梁启超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将全体民众改铸成新民来实现中国之革新的道路”^{[8]91} 转而寻求新的立足点,在《论政治能力》一节里,他把新立足点放置在“中等社会”论上。笔者认为,梁启超并没有放弃改造民众的目的,他依然强调国民的能力培养,只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他突出了“中等社会”中个人能力的培养之于国民能力培养的优先性,使解决“使民新”问题有了一个更切实的入手处。

那么,如何培养“中等社会”中个人的能力?梁启超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两条对策。第一条是分业不迁,指社会需要分工合作,如果每个人都能挑选自己胜任的行业职务,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业绩,那么整个社会将蒸蒸日上,秩序井然。梁启超批评有些仁人志士一心报国,试图一身兼做百事,到头来很可能能力不济,一事无成。第二条是互相协助。协助有积极和消极两类:消极协助指双方各干各的,互不妨碍,不以意见不同而指责或干扰对方;积极协助指施以援手或帮助。梁启超看到在中国的政治界内不同势力相互内耗,既未能消极协助,也未能积极协助,双方的政治能力增长缓慢。他说“吾实见夫数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不进,其被压抑于政府者不过十之一,其被摧夷于异党者乃十之九也,是真可为长恻者也。一言蔽之,则亦未明消极的协助之义而已。”^{[1]247} 能力的培养对于现代个人观的型塑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力性个人与力命、王霸之辨

综上所述,在梁启超的眼里,一个力性的个人将是一个体力强健、心力饱满和能力超拔的现代个人,是一个有“力”度的个人。力性的凸显是现代个人观的鲜明特征之一。这正如罗家伦所说:“这伟大的时代需要我们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为,有力的生命。”^{[9]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力命之辨和王霸之辨涉及“力”的问题。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所讲的力本论有颠覆传统哲学的力命和王霸之辨的倾向。

“力”与“命”是对立的,前者指人力,指人的

作用,后者指超越人力的东西,人无法掌控它,但它却可以掌控人。梁启超用力命之辨解释进化论。他说“物竞天择一语,今世稍有新智识者,类能言之矣。曰优胜劣败,曰适者生存,此其事似属于自然,谓为命之范围可也。虽然,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于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与命丝毫无与者也。”^{[10]304}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法则属于“命”之所为,“自勉为优者、适者”属于“力”之所为。梁启超认识到“力”与“命”各有适用的范围,不得干涉。“吾以为力与命对待者也,凡有可以用力之处,必不容命之存立;命也者,仅偷息于力以外之闲地而已。故有命之说,可以行于自然界之物,而不可行于灵觉界之物。”^{[10]304} 梁启超所谓的“力”是包容个人的体力、心力和能力在内的人之力。

梁启超还从佛教的因果报应论那里得到思想支援。因果报应论强调个人今天所受的果,即过去所造之因。个人现在所造的因,将成未来之果。这个思想突出个人的人力作用,个人之“力”是因果的主宰,是个人生活的塑造力。“故佛教者,有力而无命者也,藉曰有命,则纯为自力之所左右者也。”^{[10]306} 梁启超不把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视作命定论,而视作人力论。佛教所说的因果之命都可用人力论加以解释。在梁启超眼里,对力性价值的肯认成为佛教和进化论的共同点。

在王霸之辨上,传统儒家支持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以德服人,统治者在世间施行仁政;霸道以力压人,统治者以武力、暴力、酷法维持秩序。尚力或尚武是霸道的表现。梁启超抬高“力”的价值,宣扬力性个人观,扭转传统儒家对于王霸之辨的认识,认同霸道在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中的合理性。虽然梁启超所说的“力”与霸道倡导的“力”有一定的差距,现代科学、西方政治哲学的元素融入了梁启超的力本论,但是,梁启超对“力”的褒扬和传统儒家对霸道的贬斥存在原则性的差别。梁启超充分肯定霸道思想具有现代的价值。

梁启超在对力命和王霸之辨赋予新的认识的同时,也认识到传统儒家有许多思想资源可为他的力本论作辩护。例如,他把孟子的“浩然之气”当作进取冒险精神,进取冒险精神是力性精神的一种表现。尽管他没有对这一“比附”做过

多的解释,但是这一“比附”呈现出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梁启超为西方的进取冒险精神寻找传统儒家的资源,赋予“浩然之气”新的含义,即“浩然之气”包含“力”的维度,这“力”主要不是指道德力,而是指进取冒险之“力”,指动力之“力”;另一方面,梁启超的说法淡化了孟子“浩然之气”说的道德意味。在孟子那里,“浩然之气”主要指精神力,内蕴着道德力,是一股主要由德性修养积聚起来的精神力。当梁启超把进取冒险精神与“浩然之气”对接的时候,不免弱化了“浩然之气”中的德性成分,这正如张灏所说“梁对孟子最初这一概念道德取向的忽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看成是19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文化上的力本论的侵入,儒家道德主义不断衰败的一个微妙而准确的反映”。^{[1]135}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的说法,例如王中江的论断是“近代中国的转变基本上是朝着远离儒家‘德治’而可以称之为‘力治’的‘富强’目标迈进”。^{[1]428}从个人观上看,这种转变表现为由德性的个人观转向力性的个人观。

在近现代中国,力量是一个现代性观念。近现代中国人对于力量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近代科学对于力的推崇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人不仅讲心力、体力,还讲能力、实力、权力和各种类型的力量,如生产力、战斗力、竞争力和革命力量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力”不仅被赋予量化的特征,而且被赋予世界观的意义。“力”不仅是理解世界结构的一个基本角度,而且是理解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尺度。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中,力的现代性观念被赋予主导地位。^[12]自然地,不少近代的知识分子把力量观念与个人观的建构勾连起来,提出力量的个人观,上文剖析的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梁启超的力性个人观充分展示了现代中国的个人观建构过程中的力量原则和力本论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M]. 崔志海, 葛夫平,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 [2] 黄克武.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3] 杨贞德. 转向自我: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9.
- [4] 梁启超. 新民说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5] 严复. 天演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6] 赵紫宸. 学运信仰与使命的我解 [M] // 赵紫宸. 赵紫宸文集: 第3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7] 杨笃生. 新湖南 [M] // 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下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 [8] 狭间直树. 《新民说》略论 [M] // 狭间直树.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9] 罗家伦. 《新人生观》自序 [M] // 新人生观·鸭池十讲.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10] 梁启超. 子墨子学说 [M] //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1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1] 王中江.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 [12] 顾红亮. 梁启超《新民说》权利概念的多重含义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0(6).

[责任编辑 杨 军]

On Liang Qichao's View of Strength Individuals

GU Hong-l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In his *On the New Citizen*, Liang Qichao introduced a theory of power. Associating his theory of power with his view of individuals, it is clearly seen that Liang held a view of individuals advocating power, abbreviated as the view of strength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Liang's view of strength individuals, a powerful individual would be a strong-build, energetic-minded and excellent-capable modern individual, an individual of strength. Liang's view of strength individuals showed the tendency of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 dispute between effort and fate and between violence and peace and rev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view of moral individuals to view of strength individual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On the New Citizen*; property of strength; view of individual; strength-based theory; view of moral individual